

体制转型、路径依赖与政府治理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

程永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转型是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转型是一种危机倒逼型的发展模式,其制度框架无法事先给定,决策者的目标函数也带有较大不确定性,使得既有体制改革路径具有较为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发散性,在体制转型和利益协调等方面出现日趋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和高水平需求陷阱。而财权与事权分开的政府治理格局、基层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更是导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结构陷入脆弱性困境的重要根源。原生性的制度设计导致政府权力容易过度扩张,市场边界容易受到侵蚀与挤压,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由于路径锁定效应使得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风险大幅度上升,在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与体制转型的具体制度设计中需要加强战略风险管理,现有政府治理模式亟需加快功能转型与战略演进。

关键词:体制转型;全球治理;路径依赖;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4)06-0093-06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方面顺利实现巨大突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16万亿美元(世界第一),^①外汇储备3.821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伴随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大国实力的消长,国内外环境开始发生战略性变化和调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日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影响力也不断增长。我们认为,当前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转型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且事实证明整个改革开放历程基本上是围绕着调整和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进行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有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合理定位并履行好政府职能,才能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然而当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逐渐步入深水区,很多深层次矛盾日益浮现,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实体经济处于困境境地,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有所恶化,内需消费不足情况有所加剧,政府高层官员腐败事件频发,民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例如1993年以来的20年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平稳的阶段,也是国内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阶段,其中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5年的8.7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②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先生估计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每年已经平均超过10万起,而且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规模及激烈程度,正在呈现加剧发展态势,一味强调维稳和保增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治理格局开始出现囚徒困境式的

收稿日期:2013-10-21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批准号IRT1224)、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11JZD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批准号2012M511016)、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研究项目(批准号B2013CCS1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程永林(1975-),男,安徽人,博士,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金融经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刚性稳定现象。这仅仅是发展个案或偶发因素导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发生的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将会受到国内因素的深层次制约，而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体制深度转型也正在面临一个临界点或阈值，在现实层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和高水平需求陷阱？换言之，问题的根源是否还是在于没有处理好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定位和职能分工？这就需要学术界深入探讨政府和市场的本质关系和影响机理，尤其需要研究当前阻碍政府和市场关系和谐发展的思想束缚、体制束缚与利益束缚主要包括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演化的？如何继续通过改革开放、体制转型与政府治理模式调适来解决当下中国政府和市场两者关系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型：现实与理论探索

1949年以后，新中国由于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基于建立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等现实需求，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运动，迅速完成了公有制导向、计划经济运行模式、按劳分配体制为基础的制度重构与体制转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职能重新被界定。然而此后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由于中央政府具有广泛的管制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计划经济体制显示出资源配置低效、价格信号扭曲、缺乏有效竞争、激励机制不足、信息不完全、创新不足等严重的内在缺陷，进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③在经历经济濒临崩溃和发展危机之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成为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这场新的体制转型和改革开放率先在广大农村地区试点并得到推广，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富有创造性的产权改革，使得我国农村的体制束缚得以松绑，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至城市，中央政府先后采取政策措施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放权让利，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逐步推进政企分开和体制改革。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政府和民众日渐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作用，企业也逐渐不再是依附于国家的基本生产单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从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转变为现有体制框架内的事权下放、财政分权的运行体制。中国以发展是党和政府执政兴国为第一要务的理念为契机，以市场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逐渐放松甚至解除了束缚经济增长的政府体制羁绊与制度桎梏，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取得巨大成就。所以，肇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有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为继需要恢复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政策层面和学术领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总结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能逐步理顺政府与

市场之间的关系、定位和职能分工，关键在于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经验证明我国采取危机倒逼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总体是非常成功的。

为了解释中国市场化改革导向所诱致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现象，国内外经济学家从经济、政策和制度等研究视角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学术界普遍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象，并把原因归结为市场深化、技术进步、人口红利、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④但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之一，其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中国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弹性、市场容量虽然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可能性和发展空间，但是林毅夫提出的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理论却无法很好解释跟中国具有类似国情的印度的经济发展现象。黄亚生认为中国和印度发展相比，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经济成效虽快，但代价是牺牲了对法律和制度等市场软环境的建设，而印度对软环境的重视使其经济增长更有后劲。^⑤新制度经济学则从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诺斯认为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而且制度变迁在现实中具有自我增强机制的路径依赖性质，相反则可能处于锁定在无效或低效的困境。萨切斯、杨小凯等著名转型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实质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相比较，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和体制转型有可能会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在中长期内将妨碍宪政转型。因为体制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框架往往是无法事先给定的，所以决策者必须积极寻找新的替代性制度框架，但是他们拥有的信息、资源和权力往往又都是不完全或不充分的。同时决策者的目标函数也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内生变量。例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型和制度重构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由于“华盛顿共识”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造成学术理论与体制转型现实条件的差异，难以发现过去体制束缚、发展积弊、沉没成本对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和作用。实践证明这种自由主义导向的休克疗法不能借鉴和效法，因为容易造成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绩效与体制转型的严重脱节甚至停滞。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更是受到越来越普遍的质疑。由此，国内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研究和宣传“北京共识”的价值和优越性，进而试图总结和提炼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发展模式的经验和道路。但是种种迹象显示杨小凯等学者当年争议的学界话题正在现实中不断发酵，当中国体制转型与经济转轨逐渐步入深水区，在现有制度体系越来越无法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

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结构和政府治理模式越来越呈现刚性稳定与脆弱性，群体性事件频发就是很明确的信号和证据。因此，我们更加有必要深入探讨当前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客观评估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管理体制的运行机理和作用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深切回应萨切斯等国外学者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和体制转型有可能会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并且在中长期内妨碍宪政转型的质疑。

三、体制改革与治理模式演变：脉络与逻辑

中国的体制改革与治理模式变迁是在国家总体政治制度保持不变，管理体制不断适应形势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它们之间财权和事权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例如从1970年代末的放权让利到19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理顺政府内部之间关系、定位和职能分工的重要突破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地方政府或某些政府部门的自利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并且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逐利动机和道德风险。^⑥而科层制损耗就是在既定的利益结构、行政传统偏好约束条件下，受个人、部门或地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政策执行主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并进一步谋求利益而对上级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进行有利于其利益诉求的扭曲形变，而形成的公共政策预期社会效益与实际社会效益产生显著差异的政策失灵现象，进而导致政府维持无效率的政策安排或政策不均衡等。^⑦现实当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或相关政府部门往往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而拥有较大弹性的自由裁量权，这很容易诱发政策执行者的逆向选择与败德行为。当前部分地方政府的行为日益市场化与逐利化，与民争利现象与日俱增有沦为公司化政府的危险就导源于此。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行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以及省级以下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划分上普遍采取了财权向上集中和事权逐级下放的做法，这导致县乡基层政府普遍承担着较重的公共事务和财政支出负担，但是拥有的财政收入和支配能力却往往比较有限，这种财权与事权相背离的格局、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是导致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的根源，也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频频出现脆弱性和陷入困境的经济根源。然而在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我国政府并未大幅度改变现有的政府间财政收支和事权安排格局，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将其作为县乡基层政府财政解困的有效途径。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借助推行撤乡并镇改革试图降低行政开支、减轻县乡财政负担。2002年以来，又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以减少财政管理层级、扩大县级财政管理权限的省直

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然而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的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因为我国疆域广袤地区差异较大，政府管理层级过多，大大降低了在分税制框架下将税种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重新划分和调整的可行性，通过财政重新划分实现县乡基层政府财政解困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

由于现有政府治理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政府掌控着大量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和信息，导致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似，具有利己意识和利益最大化倾向。所以，出于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在现行强调政绩考核的锦标赛机制下，现有的国内市场经济环境导致企业竞争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价格和服务水平，还有与政府权力的合作程度等因素，因为获取政府的支持是企业能够在信贷、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获得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或保证。这样就容易导致政府官员寻租设租、官商勾结、违法违规行径层出不穷，甚至引发公众利益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进而诱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社会治理结构呈现刚性稳定等。^⑧而且目前国内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利益冲突开始趋向政治化冲突，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出现有组织、跨区域串联声援的倾向。由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导致处置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⑨因此，黄亚生、陈志武、许小年、吴敬琏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地方各级政府通过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必然力求推动现有经济体制向裙带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模式正逐渐受到利益集团的侵蚀与民粹主义的干扰，由于产权保护匮乏与宪政秩序缺失，中国改革有可能会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在中长期内将妨碍宪政转型的观点并不完全是盛世危言^⑩。2010年12月以来，中东国家先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阿拉伯之春”事件，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运动浪潮随后迅速扩展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并且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执政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中央政府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引发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导致阿拉伯国家产生动荡的主要原因很多，但毋庸置疑的是现有经济衰退失业率剧增、民众生活日益贫困是其直接导火索，但是社会治理结构失衡、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盛行则是其主要诱因，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权力与利益的寻租关系链缺乏制约。

这让我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和治理模式的差异将会足以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也一度寄望于这种肇始于民主和经济为议题的社会政治运动能够波及到中国，而当今社会网络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和舆论形成模式更是加剧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

四、体制转型与治理模式改革：路径与战略

由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实行国家权力至上的治理模式，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均围绕权力而展开，国家权力主导社会规则的制定和社会秩序的运行，导致重视国家利益本位和集体主义导向，忽视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自主空间，采取指令性甚至命令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政府管制型的治理模式。而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我国日益重视探讨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的本质关系、界限定位、职能分工和影响机理，更为强调法治和民主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和束缚，实行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治理理念，决策过程越来越趋向于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并通过政府治理转型，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来试图维系社会治理的张力与活力。然而伴随现实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深化和调整，关于现有经济治理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学术争论仍在蔓延与持续。周黎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具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张晏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节约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滥用权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 GDP 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的标尺竞争。徐现祥的研究证实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内，通过中央任命地方官员从而形成地方官员基于为增长而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其中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钱颖一认为中国成功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双轨制转轨，对于向宪政秩序转轨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根本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制度、文化、观念等内生性因素的支撑，因此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较为艰难的博弈过程。而自 2007 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的方式在惊醒世人，有必要深刻反思市场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国内近年来不仅表现在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阶层流动趋缓利益开始出现固化，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对公共政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社会治理结构呈现刚性稳定等发展趋势。而且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甚至裸官现象，具体原因很多，但是核心因素是这些经济精英、权力精英、文化精英实际上对于国家转型目标的前景难以形成确定性预期，对体制转型的前景越来越缺乏信心和安全感，进而

导致国家可能越来越难以控制转型风险和提高发展绩效，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日益面临着治理模式需要深刻转型的挑战和危机。王曦等的最新研究证实，如果基于制度变量演进的马尔科夫过程和含有纠偏因子的随机过程假说，那么现有改革和转型路径存在较为严重的不稳定性和阶段性发散，经济主体预期的静态性和预期误差的阶段性都在逐步递增。因此，在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与体制转型的具体制度设计中需要加强战略风险管理，逐渐形成一套更为清晰和系统的战略与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选择与历史经验应该淡化。由于我国内生性的制度、政治、观念、文化与传统约束，原生性的制度设计导致政府权力容易过度扩张，市场经济的基础容易具有较高的脆弱性，社会治理模式也一直缺乏张力与弹性，而金融危机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更是加强了政府而非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政府主导越是促进经济繁荣，经济、权力和社会资源便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的局面。而政府能力越来越强，资源越是掌控在政府手中，伴随着政府吸纳和汲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涉入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深，管理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宽，政府的全能主义倾向就会越来越严重，导致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受到挤压与影响，企业、民众、社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增强，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风险便会大幅度上升，这是当前政府治理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困境甚至面临治理危机的重要根源。

中国的前期改革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效应，市场化利益激励机制和晋升锦标赛竞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也是政府治理模式开始异化为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它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有助于增进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但是自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深度介入和干预经济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干预和配置资源能力也得以大幅度强化，事实上已开始越来越表现出其弊端和危害。因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或利益相关者自身也有利益考虑，由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体制安排，在中央政府的绩效考核压力、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地方政府容易和企业因利益的一致性或兼容性而结成利益共同体或政商联盟，进而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高风险。并由此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经济问题治理与经济利益调适过程中，不仅无法保证其作为仲裁者角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且往往自身就陷入到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中，这种内在利益结构困境导致政府管制能力被削弱，也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当下如果一味的强调维稳和社会控制只是在消极的回避问题，可能会日益抬高解决问题的治理成本和机会成本。此外，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重点是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划清上下级和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但是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部门利

益，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政府部门将施加影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以往的政府治理模式改革往往停留在精简政府机构层面，较少触及政府机构的激励机制问题。当将产生利益冲突的任务分配给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层级管理时，相互冲突的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往往收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偏向于自身利益，从而影响和干预政府决策和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着转变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减少发展中面临的随机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产权的初始分配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使改革早期阶段达到的增量改革或者基于共识的改革越来越难以形成，当经济发展和现有体制无法有效遏制利益集团对于国家利益和民众福利的侵蚀与攫取，政府的现有管理职能和治理模式就会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与现实挑战。因此，政府作为过去市场经济改革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就需要更多地向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者和仲裁者的方向转型。所以，现有政府治理模式转型需要同时考虑实现整体性的战略演进，需要注重从经济建设导向转向制度建设导向，从政府管理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从行政控制导向转向法律治理导向，从权力集中导向转向权力分散导向。

注释：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网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

②引自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7、298页。2005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官方和学界不再公布，可能因涉及社会稳定等敏感性问题。

③斯蒂格利茨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M]，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37页。

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新的增长理论模型，这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索洛增长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了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这一生产函数与储蓄率不变，人口增长率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假设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索洛增长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不变条件下的稳态零增长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索洛将技术进步看成外生给定的，而这恰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未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

⑤黄亚生当年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关于中印模式优劣比较的文章曾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参见 Huang, Yasheng and Tarun Khanna (2003).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Foreign Policy, pp74-81. 后来他在北京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再次详细阐释了自己观点。参见 Yasheng Huang. Soft vis-à-vis Hard Infrastructures for Economic Growth: Can China Learn From Ind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arnegie Endowment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May 26, 2006.

⑥“经济人假设”来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西尼耳定量地确定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假设”这一名词引入经济学。以贝克尔、布坎南、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进一步抽象和扩展，将其运用到管理、政治、社会、婚姻等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⑦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这种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对于科层制所引发的政策失灵和资源损耗的分析，参见程永林：《政策失灵、科层制损耗与治理机制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⑧国内现有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代表性研究主要是在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新闻传播学领域。参见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J]，2007年第2期；金太军、沈承诚：《从群体性事件到群体性行动：认知理念转换与治理路径重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J]，2012年第1期；宋维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春雷、姜红辉：《群体性事件中媒体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影响研究——基于“乌坎事件”的实地调研》，《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J]，2013年第7期。

⑨代表性研究成果如汤志伟、杜斐：《群体性事件演化轨迹的定性模拟研究》，《社会科学研究》[J]，2013年第4期；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社会学研究》[J]，2007年第5期；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J]，2009年第6期；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⑩相关论断和观点可参见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基于中国、印度、巴西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J]，2012年第1期；《陈志武访谈：国进民退是权贵资本主义》，《亚洲周刊》[J]，2009年第48期；《吴敬琏先生访谈：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中国改革》[J]，2011年第12期；吴敬琏：《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领导文萃》[J]，2012年第7期；彭晓宇、安德烈·卡尔涅耶夫：《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国外理论动态》[J]，201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Qian, Y., G. Roland and C. Xu, Why China's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J]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2] 程永林.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J]. 社会科学 研究 2013(2).

- [3] 傅勇, 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J]. 管理世界 2007(3).
- [4]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 未来 10-15 年 [J]. 改革, 2014(5).
- [5] 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J]. 经济学季刊, 2003(4).
- [6] 贾俊雪, 郭庆旺, 宁静.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J]. 管理世界 2011(1).
- [7] 李奕宏.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J]. 财政研究 2012(8).
- [8] 李剑波, 聂辉华. 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叉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4).
- [9] 王贤彬, 徐现祥. 官员能力与经济发展: 来自省级官员个体效应的证据 [J]. 南方经济, 2014(6).
- [10] 王曦, 舒元. 摸着石头过河: 理论反思 [J]. 世界经济, 2011(11).
- [11] 徐崇利. 新兴国家崛起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0).
- [12] 张军. 分权与增长: 中国的故事 [J]. 经济学 (季刊), 2007(1).
- [13]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7(7).
- [14] 周黎安, 赵鹰妍, 李力雄. 资源错配与政治周期 [J]. 金融研究, 2013(3).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h Dependence and Governance: Bivariat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based Framework

Cheng Yonglin

Abstract: The current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mode are to enhance the key influence factor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its core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However,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crisis-forced mode of development, and it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an't be given in advance, so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decision-makers is facing with greater uncertainty, which makes the existing system reform path have more significant instability in the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Problems of lack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a high level of demand trap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ests coordination. Separate financial authority and powers of governance pattern of imperfect local management system is a major source that turn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nto a fragile predicament. Native system design is easy to over-expansion which makes the power market boundaries susceptible to erosion and extrusion. The lock-in effect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 reform path is becoming the focus of conflict risk. In future,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risk management transition in the specific system design.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model needs to be enhanced.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global governance; path dependence; governance model

(上接第 92 页)

The Role Dilemma of Spokesperson in China and Adjustment

Cai Lan

Abstract: Though the institutions set completely, the policy of spokesperson hasn't been mature. The 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ship-chief took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and received multiple expectations. When spokesperson couldn't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voice of government and protector of people's right, between control the message and promulgate the message, he would walk out of the dilemma of his role. There are some key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dilemma and guiding the spokesperso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and control the messag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modern media and democracy call for a change of the spokesman policy.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dilemma.

Key words: spokesperson; role dilemma; solutions